

近代提出开发浦东的民间第一人

陈云霞

浦东开发史上,最早用“浦东”二字命名的民营企业,是近黄浦江边、张家浜南的浦东电气公司,简称“浦电”,由上海实业家童世亨(1883—1975)创办。浦电的创建对浦东早期开发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此后,华商企业相继在浦东落脚,开启了浦东实业的开发建设,为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童世亨投身浦东实业开发的想法最早来源于其早期的地理学经历。清末,西方人文地理学传入中国,大量相关著作被译介刊行。这些著作大致涉及人文地理学13个分支中的10个。其中经济地理学译著所占比重最大,几乎达到半数,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国急需振兴经济。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更是涌现出一大批人文地理学学者,而童世亨就是首批中国近代地理学先驱之一,并最终将从地理学中获得实用精神和考察方法运用于浦东最早的实业开发。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16岁的童世亨进入上海南洋公学学习。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袁世凯委任朱正元等测绘山东、直隶、奉天三省沿海地图,童世亨应试相从,足迹遍及胶州、青岛、威海、烟台山东半岛诸埠,足至荒村渔舍。之后则沿海航行北上至旅顺、大连、天津及北京等地,沿途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熟悉地貌形势,从此确立了精研地理之志,也为投身实业播下了种子。光绪三十一年(1905),童

世亨赴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门学习电气机械科,至1911年归国。与其同一批留学的还有地质学家李四光、章鸿钊、丁文江等。期间,童世亨每有余暇便编书制图,绘制了《中国形势一览图》《世界形势一览图》等。民国三年(1914),童世亨从江苏省立南京第一工业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理教员辞职回沪,在四马路(今福州路)独资设立中外舆图局,并撰写了《历代州域形势通论》。至民国十四年与商务印馆合营,童世亨共编绘《七省沿海形势图》《中华民国分道新图》《长江沿岸形胜图》等地图10余种,并作为当时中学的地理教科书。

童世亨早年周览东部沿海的经历使他具备了地理学的思考路径,这一眼界也促使了童世亨更多地关注实际问题,开始投身于实业。童世亨不仅绘制全国的历史沿革图、形势图,还对嘉定、浦东等地进行详细的测量与地图绘制。

上海自开埠以来,近代化进程加快,而浦东相比浦西,是相对落后、偏僻的所在,这在媒体和大众的“到浦东去”、“浦东乡野”、“浦东郊游”等表述中可见一斑。1905年,一群浦东先贤组建了浦东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浦东同人会(后改建为浦东同乡会)。童世亨在对中国、上海形势了解的基础上,于1912年成为中国工业会发起人之一,发布《中国工业会宣言书》,开启了民族工业崛起之始,并以浦东这一

区域作为首选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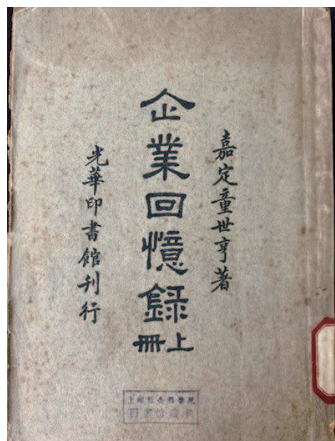
1919年,童世亨游访津浦陇海沿路各大城市,西游长江各要埠。通过详细的考察,他认为上海浦东沿江一带,厂栈林立,地方宽广,水运便利,是发展工业的最宜之地,可以大展宏图。他与浦东同乡会的穆藕初、黄炎培等共同集资,在张家浜南靠近黄浦江的一块土地上,创建了浦东电气股份公司。童世亨被推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浦电”成为浦东最早的供电设施,也是浦东最早的民族工业。

童世亨对浦东工业经济的布局设想在他后来所著《企业回忆录》中可以寻得一些路径。《企业回忆录》中册分别追溯了创办浦东电气公司、敷设浦江水底电缆、扩充浦东营业区域、筹设浦东新发电厂等浦东工业建设诸多事宜。他认为,浦东将来的希望并不在商业而是要依赖工厂。浦东当时分为高桥、高行、陆行、洋泾、塘桥、杨思等六区,地价低廉,距离浦西近且水运便利,随处可建厂屋。但受到电力供应的限制,当时位于陆家嘴的华章造纸厂、祥生造船厂、日华纱厂、英美香烟公司,洋泾港口三井堆栈、老太古蓝烟囷码头都急需电力供应。如果在浦东设立电力公司,浦西闸北和杨浦沪东等地的相关产业则都会迁至浦东,也不必集中于苏州河沿岸寻求动力支持,甚至可以支撑汽车交通之用。

在《创办浦东电气公司之呈文》中就讲到“童君颇注意于浦



童世亨及其所著《企业回忆录》



东电力营业将来”,其目标是能日夜连续供电,以支持浦东工商企业的机械和照明正常运转。在童世亨看来,电力工业是其他各项工业发达的基础,“有电力输送则各工场备一马达即可运转机轴,无锅炉引擎设备之繁,无煤斤火油消耗之费成本”,即不用再另外准备发电机。童世亨对浦东电力开发的这一观点是为了对标浦西的发达工业。童认为上海公共租界与闸北一带因为有稳定的电力供应,各种工厂才得以兴盛。但浦东工业的发展短板在于没有电力的支持,仅有的几个工业集中点大多分布于烂泥渡一带(即现陆家嘴附近),选择近水之地,自备锅炉、引擎,这些设备的费用就决定了浦东的工业远不及浦西工部局的电力供应。而当时企业家的目光也大多局限于南起白莲泾、北至陆家嘴、东至洋泾港的区域,其他地方则是一片田园风光。童世亨认为,浦东地价低廉,有便利的水运条件,只要电力供应跟上,便可于随处开设工厂。

在此基础上,童世亨进行了

详细的市场调查,考察了美孚火油栈,参观工厂,并致函招商轮船总局、怡和轮船公司、太古轮船公司、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日清轮船公司、三菱洋行、开滦矿务局海洋社、东清铁路公司等询其需装灯数等业务情况。而对当时的普通民众用电加以统计发现,沿黄浦江各市镇需用灯数在烂泥渡、杨家渡、陆家嘴一带,至少当有七八百盏,在洋泾一镇当有百余盏。加上沿浦一带码头、厂栈灯数至少当有二三千盏。经过他的考察,发现浦东当时的工业类型,以碾米、轧花、纺纱、织布等工业最有市场,但相关产业工厂却因为南市没有电力而几乎都分布在吴淞江以北。童世亨希望通过浦东电力工业的建设,吸引闸北的碾米和轧花业迁往浦东白莲泾、张家浜一带。

开埠以后,由于航运条件便利和水资源充足,苏州河两岸成为上海工厂的集中区,也导致苏州河严重的水源污染。由于纺织厂不是必须使用电力,

(下转7版) ➔

← (上接5版)

年租290986文;惠利士(Wills, C.)租地面积59亩7分1厘2毫,年租179134文;沙逊行(Sassoon, A. D., Sassoon, D. S.)租地面积40亩3分6厘1毫,年租121082文;宝文行(Bowman James)租地面积39亩2毫,年租117006文——仅这四家租地面积超过Kirk医生。相比之下,获得道契第一号的名副其实的“抢滩者”宝顺洋行,当时所有租地只有21亩3分7厘7毫,年租64132文。

利用道契资料已将Kirk医生在上海的产业厘清,然而道契仅记录地块四至,难以定位。所幸,伴随着开埠早期大比例尺实测地图的开发,将道契信息定于地图上变成可能。《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藏哈

佛大学)和《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洋泾浜以北》(藏上海图书馆)两图均为实测地图,均有数字清晰绘于地图幅面。经考证,这些数字就是道契的地分号(Lot)。

结合道契和地图信息,将Kirk医生的产业定于地图上,可知,Kirk医生首租的第65分地在今宁波路和河南中路路口,从利查士处转手租的第73分地在今宁波路与江西中路路口,从打喇士处租的第64分地在天津路南,这些产业都在今宁波路附近。工部局所指的“界路朝柯克医生产业”应当是第65分地(更靠近河南中路)。

虽然工部局的会议录没有详细记录修筑此路的细节,但是在1861年“伯顿医师请求董事会在已拟定从华人谷场向西至苏州河开辟一条新的马路”

时,工部局没有接受他的请求,而是告知“只要伯顿医师安排好从华人手中购得土地并准备付还这条道路的费用,那么这条道路将在董事会的监督下进行建造”,看来工部局在道路建设中实则主要起监管之责。对比两幅地图,1849年地图上今宁波路地方还是一条河流,至1855年地图时已经修建成马路,按照工部局的会议录,“整条道路只得由柯克医生提供”,那么Kirk医生应当是提供了该道路修筑的土地和资金,这样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这条马路以他名字命名,就像现在各地所见的“逸夫楼”一样。至于Kirk医生为何修建这么一条马路,或许与上面提到的伯顿医生一样(伯顿医生当时租的土地近今北京东路),是为了使得原本偏于英租界边缘的产业与

外界有更多的联系,增加医院的受众群体。

道契不仅记录首次租地的情况,该地所有的转手情况都会一一记录,因此不仅提供了Kirk医生产业位置的信息,还提供了医生生平线索。咸丰七年九月初六日(1857),英人格医生将所租第23号第65分地,记20亩,又第41号第73分地基内划出一亩一分六厘9毫,转与西法波郎得租用。然而,咸丰十年九月十二日(1860),Kirk医生租的第37号第64分地再转手时,我们遗憾地看到,“已故英人格医生有先后所租第37号第64分地,经由经理人怡艾弗东更生所派之……”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位长脚医生是在1857—1860年间去世的。再翻阅这几年的《北华捷报》,因该报会将各大城市(包

括上海、北京、宁波、香港、澳门等)的人,包括原本在这些城市而后移居国外的人的出生(Birth)、死讯(Death)、嫁娶(Marriage)都刊登在报纸上,按图索骥,我们在1859年12月24日的报纸上看到了Kirk医生的讣告:Kirk Thomas医生,于10月17日于都柏林去世。报纸没有详细报道他的死因和年纪,以及为何身在都柏林。

借由《北华捷报》《上海道契》《上海年鉴》《行名录》以及地图资料,终于厘清宁波路旧称Kirk's Avenue的由来,也弄清Kirk医生生平之一段。他在开埠之初就到达上海,置办了不少产业,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英租界一条主要马路,然而,最后一切都在历史中烟消云散。(作者单位:上海社科院历史所)